

# 云南大理白族建筑

YUNNAN DALI BAIZU JIANZHU



云南大学出版社

# 云南大理白族建筑

大理白族自治州城建局  
云南工学院建筑系

编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滇新登字 07 号

责任编辑:周永坤 张世鸾

封面设计:袁亚雄

### 云南大理白族建筑

大理白族自治州城建局

云南工学院建筑系 编著

\*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北院内)

昆明清泉彩印厂印制

\*

开本:787×1092 1/12 印张:18 插页:60 字数:450千字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81025-442-1/TU·0 定价:80.00元

## 《云南大理白族建筑》编写组成员

组 长:张增堂

副组长:杜俊生 蒋高宸

组 员:胡人虎 吕 彪

杨大禹 何俊萍

主 编:蒋高宸

副主编:胡人虎

为大理古滇昆一古书题

借取毛诗阮推陈出新

尹深  
九四  
四月廿五日

## 序 一

白族主要聚居在云贵高原西部以洱海为中心的滇西高原地带。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森林密布,物种繁多,是白族原始先民繁衍生息的良好场所。

据考古发掘,大理马龙、宾川白羊村、祥云大波那、剑川海门口遗址内分别发现了半穴居、干栏式、井干式、木骨泥墙房屋遗址,各种石器、陶器、碳化稻种及动物残骸,说明白族先民远在夏商时期就已定居在这里,以种植、狩猎和渔牧为生,至今已上万年了。

和人类居住发展一样。白族原始先民从搭“棚”而居以避风雨兽蝎。逐步发展到建造半穴居、干栏式、井干式和木骨泥墙房屋,不断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到新石器晚期已出现了简单榫卯的木构架房屋。战国时期白族先民聚居区已进入青铜器文化的社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居住建筑技术和艺术,也随之改进和提高,居住环境进一步改善,据大理大展屯出土资料,汉代洱海地区已出现了斗拱结构和瓦房建筑,唐代后的历史长河中,白族人民不断吸收先进的汉代文化,使之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创造出了具有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光辉灿烂的白族建筑文化,使白族建筑成为中国民族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存至今的大理唐代崇圣寺千寻塔可与西安小雁塔相媲美。剑川石宝山石窟人物造像和精湛雕刻工艺水平与国内其它知名的石窟相比也毫不逊色。

白族工匠传统工艺世代相传至今,剑川木匠被誉为“鬼斧神功”,大理苍山脚下的石匠、海滨泥瓦匠及雕塑工匠都是世代闻名的能工巧匠。解放后由这些能工巧匠组成的古建筑队曾分别到北京、内蒙、河北、宁夏、陕西、甘肃、四川、西藏、深圳等省市及云南各地进行古建筑修建,受到好评。白族建筑传统文化具有很高的学术性、艺术性和实用性。

解放后,国内外许多知名的建筑专家、学者对白族建筑文化非常关注,但由于条件限制,还不能进行系统搜集整理工作。大理州建设局与云南省工学院建筑系合作,到白族聚居的村寨、城镇、风景名胜区对白族民居和古建筑进行了重点考察,搜集了大量资料。经过一年多的艰苦细致的劳动,终于在1991年3月完成了《云南大理白族建筑》一书。初稿经征求专家学者意见后又进行了修改和补充。现定稿出版。

《云南大理白族建筑》是一本目前白族建筑综合性建筑专著,试图对白族古建筑、村镇、民居及传统工艺等方面作一些探讨。并引起有关专家及对白族建筑有兴趣的学者的关注。以便对进一步研究白族建筑,弘扬白族建筑文化,促进建筑业的不断发展有所裨益。

白族建筑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这次收编时间仓促,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也还会有留存在民间的重要资料,有价值的民居和古建筑尚未发现,同时,本书由各作者分头执笔,对历史问题看法不完全一致,为了尊重各作者,书中保持了原稿的面貌,还请读者见谅,并恳求指正。

但愿本书能对进一步研究整理白族建筑文化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是为序。

大理州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

张增堂 杜俊生

1991年12月

## 序 二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云南民族建筑形式多样,朴实无华而丰富多彩。为了弘扬中华文化、繁荣建筑创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服务,调查、测绘、发掘、整理、研究各民族的建筑情况,抢救即将消失的历史遗存,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省设计院从1962年到1981年,断断续续地对云南一些地方的民居,进行了调查研究,于1986年6月,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云南民居》一书;云南工学院建筑工程系创建后,由建筑学教研室主任朱良文主编,于1988年1月,由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了《丽江纳西族民居》一书。两书的发行,对云南各民族建筑的发掘、整理,做出了扎实有效、艰苦开拓的工作。

为了更深入、更广泛地开展对云南各民族建筑的调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批准资助由云南工学院建筑学系蒋高宸教授主编,与省内有关单位密切协作,开展题为“云南民族建筑与文化”的专题研究。这是一个对云南省建筑领域有重大意义的科研课题。它从地理学的角度、人类学的角度、历史学的角度、民族文化的角度……综合全面地来探索体现在建筑上生生不息的、鲜活的精神,这是一个具有新的思路、新的设想、亟待探索的课题。

经过几年来与有关单位的密切配合及具体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核实了不少的报刊资料。与此同时,还分批分期地作了些实际测绘与考察访问工作,取得了一批宝贵的成果。

本人出生于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农村,从事建筑科研、设计、施工、管理、教育的工作五十余年,对自治州的山山水水,有深厚的感情,耳闻目染,对自治区内的建筑,有深切的领会与偏爱。解放后曾在《云南日报》上,对白族民居作过简略的介绍。粗读本书稿后,深感内容充实,叙议精当,应主编蒋高宸教授之邀,乐为之序。

当前,全国人民在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指引下,蓬蓬勃勃地走改革开放之路,深信云南民族建筑之花,前程似锦,必将结出丰硕之果。

云南工学院教授 王槐清

1992年7月12日

# 总 目 录

序 一	张增堂、杜俊生
序 二	王槐清
总 论	蒋高宸 (1~24)
古建筑	胡人虎 (25~84)
民居建筑	杨大禹 (85~132)
木构技术与建筑装饰	何俊萍(133~164)
村 落	吕 彪(165~204)
后 记	(205)



不妨首先挑明：我们对传统建筑的研究，目的主要在于寻找一种鲜活的精神，而不在于复活某种僵死的方法。

大理白族建筑的诱惑，正是在于它的生生不息的鲜活精神。尽管在方法上它也提供了堪称精华的范例，而且不能不承认，这种范例，无论在而今的现实里或是在面向未来的发展中，均不失其借鉴的价值。但是，历史地说，任何一种方法，尽管它曾被认为是多么的完善也罢。终归也无不会象产生它的时代基础那样，转瞬即逝。只有精神，那种植根于本土文化以及人类本性，并升华后被体现在建筑之中的精神，才将是长久地与生命一般地永恒的。

那么，什么是大理白族建筑的精神？我想，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说：面对人生的理智和面对自然的情感，是编织大理白族建筑精神的经纬。有史可证的四千余年大理建筑的发展历史，无不贯穿着人们在为创造自身所需的安乐居住环境前提下的、在理智与情感之间的不断寻觅。

## 一、关于白族及其聚居的中心地域

无论是追溯历史，或者是纵观现实，对于白族，对于大理，许多人都不会生疏。有论者在述及文化系统的生成和演化时，曾提到过一种“十字路口地带”和一种“区域文化中心”的概念。所谓“十字路口地带”，是指那些“文化特征扩散流”的通道和汇集地带。占据着这种地带的人类群体，“能最大程度地占有人类的知识、技术、物质和经济过程”（王星、孙慧民、田克勤：《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上海人民出版社，P. 104）。这种地带，处于“文化刺激发生的重要位置上，对所在区域的文化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同上，P. 104、P. 105）笔者认为，就云南而言，大理就是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地带”。白族



A5 淼淼银洱浪：洱海微澜，白人荡舟数风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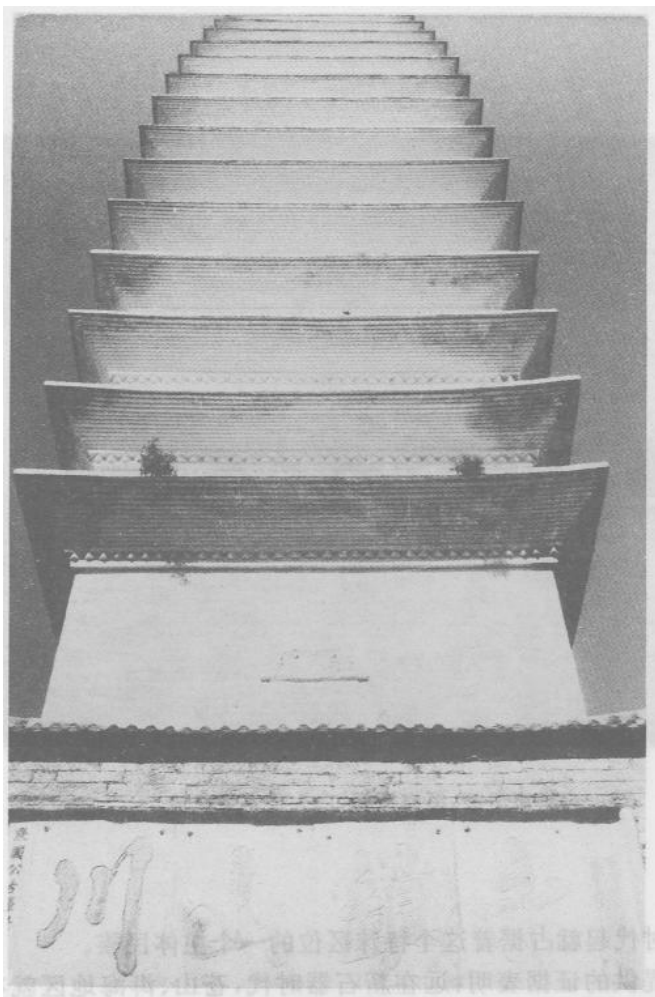
是从远古时代起就占据着这个特殊区位的一个主体民族。

考古提供的证据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苍山、洱海地区就有人类频繁的活动。经过云南，由北向南传播的我国古代西北内陆文化流，和由南向北传播的东南沿海文化流，都以洱海、滇池地区为孔道，并在以这一地区为中心的广大范围内交汇融合，使这一地区成了横断山系中，文明发达最早、也延续最久的地区之一。

自公元8世纪以后，相继有“南诏”、“大理”等地方政权在这里崛起，并统领云南，威震中原，前后达五百年之久。辉煌灿烂的南诏、大理文化，是古滇文化和两爨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云南古代文化的巅峰。（图A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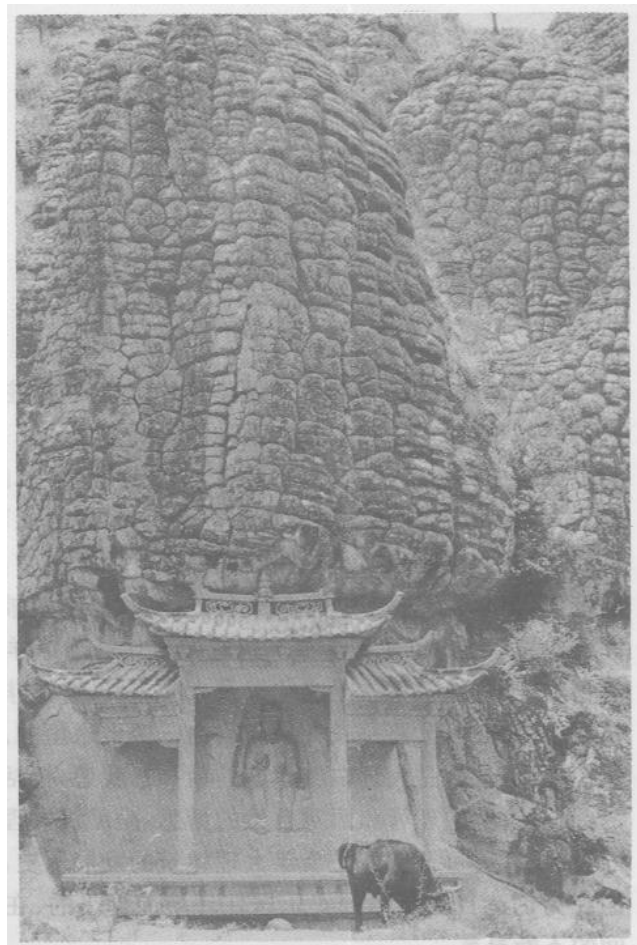
元代以后，作为一个行省，云南开始归属中央政权的直接管辖。继经明清两代的经营，大理不仅拥有农桑渔猎之富，而且享有文献名邦之誉。清末民初，冲破封建传统的桎梏，云南的民族资本又率先在大理崭露头角。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它的十字路口区位的特殊价值。

所谓“区域文化中心”是指这样一类地区，在这类地区“人类文化群体聚合较早，而且将技术、潜在资源和人类努力三者成功地结合，从而使这些地区自然变成人口中心以及成功的生活方式之策源地，即成为文化中心。在这些中心里，文化传统已趋稳定。人们



A6

千寻塔高，映着南诏云烟 永镇山川，佑我万代昌盛



A7

剑川石钟寺里的「菠萝石」；大山的造型，心中的神灵

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在该地应如何生活的标准。并且，这些文化中心不断向外传播出生活方式、技术、传统和文明社会的人类系统。”（《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P. 105）云南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多次交替地出现过这样的区域文化中心。最早是秦汉时期的滇池地区——古滇文化的中心；继而是东汉至两晋时期的味县地区（现今的曲靖一带）——爨文化的中心；接下来便是唐宋时期的以“银苍玉洱”为中心的大理地区——南诏、大理文化的中心。元代以后，云南的文化中心虽然转移到了现今的昆明地区，但在滇西北，大理仍未失去其文化分中心的地位。（图 A6、图 A7）

广义而言，一种文化的发生、形成，离不开两个重要的基础：即地域的自然条件和人类群体的创造。

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文化的起源对特定的地域自然条件有着依附关系。自然环境为人类生存提供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同时，不同的自然环境能向人类提供的资源数量、种类有极大差异，并且，“资源的赋存量和赋存形式”也不一致，这些都无不影响到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参看《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一书）

人类对居住环境的选择，离不开“食”和“性”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食”者，即有充足、稳定的食物来源，以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性”者，即有适宜的生殖、养育条件，以满足人类繁衍的需要。希腊学者道萨迪亚斯（Doxiadis）在其所著的《人类聚居学与生态学》一书中更具体地指出：地球表面的“可居住性”存在着差异，并提出了三条评价的标准：

“·海拔高度：海拔 3000 米以上的地区是无法居住的，1000~3000 米高度之间的地区可以居住，但相对来说条件较差。

·气候：可以按气候条件不同而分为宜人的、一般的、可忍受的、严酷的、难以忍受的、非常难以忍受的六类不同地区。

·水资源：以 5 升/秒·千平方米为水资源是否充足的分界限，低于这个数值的地区就是缺水地区。”（转引自吴良镛：《广义建筑学》P. 36）参照这个评价标准，我们试来看一看大理。

大理地处东经 99°49'~100°27'，北纬 25°34'~26°24' 之间，当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结合部，洱海盆地的海拔高度为 1965 米，大理州内其它几个主要坝子的海拔高度列举如下：

- 祥云:1965 米
- 宾川:1422 米
- 鹤庆:2193 米
- 巍山:1715 米
- 弥渡:1679 米

除宾川坝子属低坝类型之外,其余坝子均属中坝类型。海拔在1500~2300米之间的中坝,有着“四时之气,常为初春,寒止于凉,暑止于温,寒暑适中”的良好气候条件。为高产农业区,也为居住的最适宜地区(这一点与上述的第一项评价标准不尽一致),是云南宝地中的“掌上明珠”。白族中的大部分人口就居住在这样一些坝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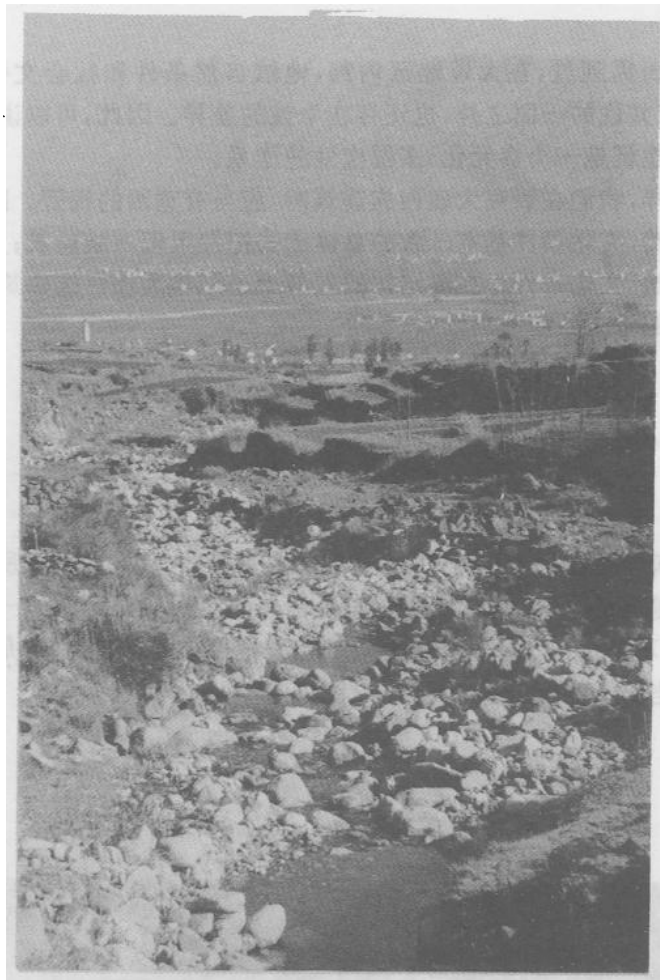
在上述坝子周围为山地,山地面积约占大理州属各县土地总面积的80~95%。山地中出产木材、药材等物产,动植物资源丰富,是坝区资源的不可缺少的重要补充。

由山泉、溪流、江河、湖泊形成的水系,使大理地区不仅免除了枯旱之虞。而且造就了奇异的自然景观,即不仅拥有山地巍峨的阳刚之概,而且还兼有泽乡秀丽的阴柔之姿。明代名儒杨慎曾留驻大理多时,对大理有很深的了解。他这样描写大理:“山则苍龙叠翠,海则半月拖兰……香风满道,芳气袭人,余时为醉而醒,为梦而觉,为久卧而起作,然后知吾响者之未尝见山水,而见自今始。”(杨慎:《游点苍山记》)具有如此优厚自然条件的地域,必然是孕育伟大文化的母体。如果说,在一种文化的发生和形成过程中,一定地域的自然条件只是一个被动因素的话,那么,主动因素当是人类群体的创造了。(图A8)

白族是云南历史悠久的土著民族之一。在历代史籍中所称“滇僰”(秦汉时期)、“叟”人(东汉、西晋时期)、“白蛮”或“西爨白蛮”(汉唐间)、“民家”(明清时期)等,是今天白族先民的主体(参见:《白族简史》P. 1—31)。白族作为一个稳定共同体的形成,大约在大理国时期,即当宋元之间。

白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无自己的文字。白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文字一直沿用汉文。

白族与彝语支各族,特别是同彝族,长期和睦相处。至迟,到公元2世纪时,又与汉族(邻近地区的汉族或移民,或因战争等原因流落进来的汉族)发生了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在白族形成的过程中,融合进了为数不少的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成分。例如:仅在唐代唐王朝对南诏发动的天宝战争中,流落于洱海地区的,和被南诏所俘,而被安置于洱海地区的汉族人口数,就不下十余万之众。这些人后来都融入到当地白族居民中去了。南诏之后,当地部分彝族的



A8 清碧溪下的卵石沟

“白族化”也是有史可证的。

历史证明:白族是一个有不断追求、善于学习、勇于创造、能够“亲邻善处”的优秀民族。大理文化的繁荣,与白族这些优良品性和贡献是分不开的。

从建筑角度进行发掘可知,白族先民,从远古时代起,便借助于自己面对的自然所提供的可能条件,为着获取居住的安全和自由而进行着不断的加工,由浅层到深层;由简单到复杂;由粗放到精细;由物质形态的硬件到意识形态的软件,一代一代地实践、积累,终于成功地实现了若干典型建筑模式的创造。从遗留到今天的丰富建筑遗产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大理白族的巧于利用自然,对自然的亲和与遵从;同时也领悟到大理白族的巧于把握时代,对时代的忠实与塑造。

说到底,建筑不是孤立的。地域的自然条件和民族的文化特性,是决定着建筑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两大相关因素。

上面提到过,在大理地区内部,地域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除有共性的一面之外,也还存在个性的差异。因此,可以说:大理白族建筑是一个多元化、多层次性的体系。

这样,我们在研究大理白族建筑时,应当有宽阔的视野。既从地域自然、文化条件基本一致的总体上去把握大理白族建筑;又从地域自然、文化条件存在微结构的差异上去把握大理白族建筑,这就是我们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 二、大理白族建筑的历史动向

建筑总是在历史中流动,不会在历史中凝固。现在为人们所见的大理地区的白族建筑,实际上只是白族建筑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片断,而不是全部。从可知的源头起始去把握它的历史动向,是研究中应当给予关照的重要一环。(图 A9)



A9 似曾失落的陂陀石构

### (一)远古人口的流动与环境选择

有记载说:“大理上古居民,多住于高山陂陀上。”(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P. 141)(以下简称《史稿》)对此“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该考古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苍山坡上,凡经古人居住之地,必有阶梯式之平台,台之边周,自数里以外或高山顶遥望之,极为清楚,至近处反不易辨别。……史前遗址所在,多为山之缓坡,包含由四、五台至十余台不等。每址居民散处各台上,不相连。大概当时居民,同一血统或同一部落者,散居于同一山坡上。……地势越高之遗址,时代越早。……”(转摘自《史稿》P. 141)

上述所谓“地势越高之遗址,时代越早。”似乎说明:远古苍洱境的居民人口,曾经是由高山向平地方向流动的。及至后来“乃离弃山地,经营平原生活。”(《史稿》P. 142)

另有明代杨慎在《滇载记》中提到:“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转摘自《云南各族古代史略》P. 416)这指的是三国之时,蜀汉诸葛武侯平定南中以后的事。“诸夷”中,想也包括大理地区的白族先民在内。以上两说,可以相互印证。

这种远古时发生的人口由高山向平地的转移,带有普遍的意义。系人类出自对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理智的客观选择。山地环境,对于人口尚少,以游猎、采集或游牧生活为主的原始部落来说,也许是必然地不得不依赖的。但是,在这种依赖中,潜藏着生产力低下,求食艰难,生活困苦,恶劣自然条件损伤着人体,并迫使人的生存安全和自身繁衍受到威胁等极不稳定的因素。为从这些不稳定因素中求得解脱,除对山地加深开拓之外,平地成了最佳的迁移地,后来,人们正是作了这种选择,在滨临洱海的平地环境中,开农田、事渔业,充分利用远较高山为好的生聚条件,从而奠定了大理地区尔后发展的基础。当地的先民们,方始脱离了苍山之上的原始的“半穴居”阶段,过渡到了平坝地区的“建城邑”阶段。(图 A10)

有一种看法,说大理古代居民“喜居陂陀”。这“陂陀”应是指从高山到平地之间的过渡地段。联想到《管子》里的一段话:“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管子·乘马》)这段话虽是对营建国都的选址而言的,但有普遍



A10 人·石头·水

的意义。或旱、或涝，无论对于村落、集镇、城市等人居环境来说，都是有害无利的，所以管仲告诫人们，要选择“大山之下”、“广川之上”的地方去营建，否则，或者“水用”不足，或者“沟防”不省。这“大山之下”、“广川之上”的地段，我想就大致犹如古代大理居民喜爱的“陂陀”。那“喜居”之“喜”，是与古人管仲的共识，是符合科学的理智判断，而不仅仅只是肤浅的、情感愉悦的追求。这具体说明：功利的目的，始终是人类对生存环境选择的基础。（图 A11）

以上，是针对大理古代居民对大环境的选择而言。至于对大环境中微结构的选择，当另在分项研究中去总结。

大理古代居民，从高山流向平地后，得到了许多新的环境效益，但也丧失了若干原来具有的优势。例如：高山地势高，高亢干燥，少有潮湿和水患。一旦徙居平地，潮湿、水患与人的生存的矛盾就突出出来了。原来半穴居式的山地居住方式，移到平地来显然已不合适。能够适应新的环境的新的居住方式，等待着人们去创造。无疑，这便成了尔后刺激平地居民住屋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导向性因素。

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即就整个大理地区而言，高山多于平地。由高山向平地流动的人口，只可能是当地古代居民总人口中的一部分，而不可能是全部。因为受到平地环境容量的限制，或遇到其它人为的或自然的种种因素的阻隔，另一部分居民则仍然只能在高山滞留。久而久之，就出现了所谓“下方夷”和“上方夷”的区分。与有幸地获得新的具有优势发展条件的、流入平地的“下方夷”相比，仍然在高山滞留的“上方夷”，不得不继续留在并非仁慈的山地环境中磨练、争斗。尽管前进的步履维艰，但终归也在亦步



A11 石墙、草顶小屋



A12 石头建筑的延伸：石构店铺，招览四方来客

亦趋中得到发展。这样一来，“上方夷”和“下方夷”在原先共有的基础上分道扬镳，各自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发展了山地建筑和平地建筑。这是大理白族建筑在发展中出现的一次可知的分野。（图 A12）

## (二)本土文化的本源及建构新文化的选择

1990年“蒙特利尔宣言”指出：“建筑是文化的表现，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形象。”（《建筑学报》1990年第8期）这提示我们：在研究一个地区的建筑时，除了注意研究形成它的根据之一的地域因素之外，不能忽视研究形成它的另一根据的社会文化因素。（图A13）

大理古代文化，亦即大理本土文化的本源，乃属我国古羌族文化，或称夏民族文化系统。从自然地理角度探寻，“夏民族文化，以甘肃、陕西、青海、川北、川西及云南大理一带为其发展之区域，在北纬25度以北，夏民族文化色彩，非常浓厚；至北纬25度以南，则渐渐淡薄。”（《史稿》P. 20）在此区域内之所以形成有共同倾向的一个特殊文化圈，是因为“在此广袤区域中”有“大致相同的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史稿》P. 21）

从民族分布角度探寻，在与青康高原接近的，包括大理地区在内的滇西北地区，为古羌族群的主要分布区。

范义田：“云南民族，以接于青康高原之羌族及接于川湖湘盆地之濮族，为其主干。”（《云南民族之史的分析》，转摘自《史稿》P. 22）

学者们论证：“台（傣）族，乃散布于北纬25度以南。与大理一带民族之关系，甚为稀少。”（《史稿》P. 23）

弄清楚了古羌族文化是大理本土文化的本源，才不谬于把握与大理建筑发生和发展相关的一条脉络。并终于找到了大理古代居民“住陂陀之习俗”的根源。苍山遗址中有半穴居遗迹，以及在宾川白羊村遗址中，有木骨泥墙房屋等表征的文化根据。

西汉武帝的开发西南，对大理本土文化带来了新的撞击。西汉武帝以前，大理一带尚处于氏族部落阶段。《史记》中记述说：“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嵩、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对于嵩、昆明，徐嘉瑞作过以下的解释：

汉代之嵩即云龙。

作为指地名，昆明有三：一为汉之昆明，即今大理。武帝所凿昆明池（元狩三年），即象西洱河。二为唐之昆明，即四川盐源，唐武德

二年置。三为元之昆明，即现今作为云南省之省会。

作为指民族，“昆明”是自汉至唐、宋时居住在滇西北、滇东北，四川的越西，盐源，贵州的水西等地区的少数民族群落的总称。大约在公元4~5世纪，昆明族群逐渐分化为两大族系，即东爨乌蛮和西爨白蛮，并分别发展为今天的彝语支系各民族和白族。（以上详见《史稿》P. 40）

西汉时，根据张骞的建议，为谋求通往身毒国的道路，汉武帝派使者来滇，但是，被“闭昆明（大理）”。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巴蜀兵击灭“劳深靡莫”之属，降滇王，在云南设置益州郡。从公元前105年开始，在大理地区设置了叶榆（今大理）、比苏（今云龙）、云南（今云南驿）、邪龙（今巍山一带）四县，统属于益州



A13 观音堂石殿：谱写“观音负石”的传说

郡。自是,开始了大理地区正式设治的历史新时期。

就文化而言,由此开始的新时期,是本土文化的原始基础受到已经生长起来的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极大冲击。谋求在新的基础上建构新文化的时期。在两种文化的接触中,由于中原文化较之大理本土文化具有明显的优势,以及大理地区存在着汉民族人口曾大量融进白族人口中这样一个事实,因而对汉文化难免有着微妙的认同感。因为这些,面向中原成了大理在新时期建构新文化的当然选择。这一趋向,尤以南诏和南诏后表现最为突出。举例说,南诏上层人士主动学习汉文化,通用汉字,任用汉族知识分子为官或为王室教师。并派出子弟到长安、成都等地求学,前后历五十余年之久。大理国时期,也不断从内地购进经书典籍。(图 A 14)

本土文化不断与汉文化的合流,成了西汉以后大理文化再生的主导趋势。在云南诸民族中,大理白族是接受汉文化最早、所受影响最深、自身文化发展最快、以及对云南地方的发展推动最大、贡献最大的民族之一。当然,这与白族的文化宽容,善于吸收的开放意识,和善于改造的创造精神是分不开的。由于在文化上发生了面向中原的转变,建筑上相应地也发生了一个可以称之为“汉化”的过程。这个所谓的“汉化”过程,即是利用中原汉民族的建筑经验,来满足云南各民族自身居住需要的过程。这一过程明显地是从汉晋时代开始,并一直延伸到近代,甚至直至现代,在大理和云南广大农村中,这一过程尚未完结。

大理建筑发生“汉化”的事实,在有关历史文献中曾多有记述。

郑颢(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说:“白人,居屋多为回檐,如殿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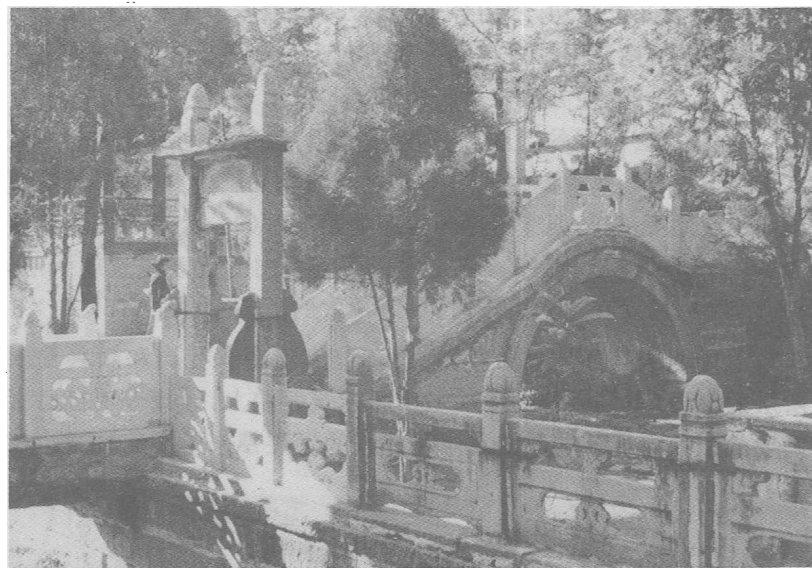
同上书卷四,说:“俗本于汉”。郭松年《大理行记》曰:“大理之民,数百年之间,五姓固守,……固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

汉式建筑在大理的出现,即是上面所说的建筑汉化过程的必然结果。根据现有资料,大理建筑的汉化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这样两个阶段:

### 1. 初传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指从六诏分立到南诏、大理这一时期。

西汉以后,以洱海为中心的大理地区,社会形态发生了急剧的



A14 西云书院中的石桥·石坊·石栏杆

变化。由“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原始氏族社会,向经营固定农、牧、渔业,出现阶级分化的奴隶制社会过渡。由于生产发展,人口集聚。到唐代之初,洱海周围出现了许多部落,他们被统称为“洱海蛮”或“松外蛮”。新唐书列传一百四十七下云:“松外蛮,尚数十百部,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凡数十姓,赵、李、杨、董为贵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长,有城郭文字,颇知阴阳历数。”(转引自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P. 190)

到公元7世纪中叶,由于这些部落相互兼并,遂形成势力最大的六个诏国,史称“六诏”。这“六诏”即是:

蒙舍诏,今巍山南部一带;

蒙嵩诏,今巍山北部一带;

邓赕诏,今大理、邓川一带;

浪穹诏,今洱海一带;

施浪诏,今洱源三营、牛街及剑川、鹤庆的部分地区;

越析诏,今宾川、鹤庆双江一带。

上述每个诏国的首领便是一个大奴隶主。为维护他们所集聚的财富和拥有的统治权力,每个诏国在其统治的中心地区纷纷营建城邑,从而导致出现了云南历史上营建城邑的第一次高潮,并在洱海地区形成了汉唐间的小城邦共处时代。

到公元8世纪初,六诏合一。蒙舍诏首领皮逻阁在大唐王朝支持下,建立了南诏国。皮逻阁受唐册封为云南王。自是,云南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地方性奴隶制政权。

大理社会出现的上述新变动,造就了新兴的生产方式——奴隶制生产方式。奴隶制生产方式较之原始公社制生产方式,具有更高的先进性和能够创造出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大理社会的新变动,也造就了一个新兴的,包括南诏王室在内的奴隶主贵族阶层,这个阶层,当处在上升阶段时,具有很大的活力。(图 A15)

原始粗放的原有本土建筑,已不能满足新兴社会和新兴贵族阶层的需要,他们必然地要在城市和建筑面貌上,寻找表现自己所需要的新的象征。这就给城市和建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刺激。在

这种新的刺激的作用之下,建筑出现了新的动向和新的分化:

- (1)贵族的宫殿和府邸建筑,从传统的平民住屋中突起;
- (2)带有多种社会功能的新的建筑类型,从固有的、单一的居住建筑类型中突起;
- (3)带有新的象征意义的建筑形式,从旧的、不足以表达新意味的形式中突起;
- (4)新的、丰富的建筑艺术语言,从原有的、贫弱的建筑语言中突起;
- (5)“都城”和以象征权力为中心的各类新城邑,从旧的原始村落中突起。

这些新的分化,促进形成了两种建筑文化,即:贵族建筑文化和平民建筑文化。这是以不同的社会阶层进行划分的一个统一文化中的两种亚文化。

当其时,以新的生产力为基础的新技术,为实现对建筑的新要求,提供了物质的可能。紧迫的问题是要找到一种能够适应新要求的、新的建筑逻辑,或者说是要找到一种可以凭借来表现新兴阶级的新的建筑象征方式,正是在这样关键时刻进入的中原汉式建筑的经验,从理论到实践,恰好起了带有榜样价值的示范作用。这就使大理建筑的汉化过程获得了内在和外在的动力。(图 A16)

大理建筑汉化过程的初传阶段,具有如下特征:

(1)在对象上,当初传阶段,“汉化”只限制在贵族建筑和为贵族政权服务的建筑上。例如:

“都城”有太和城、羊苴咩城等;

“宫室”有南诏大衙、五华楼等;

“庙宇”有崇圣寺、慧光寺、觉照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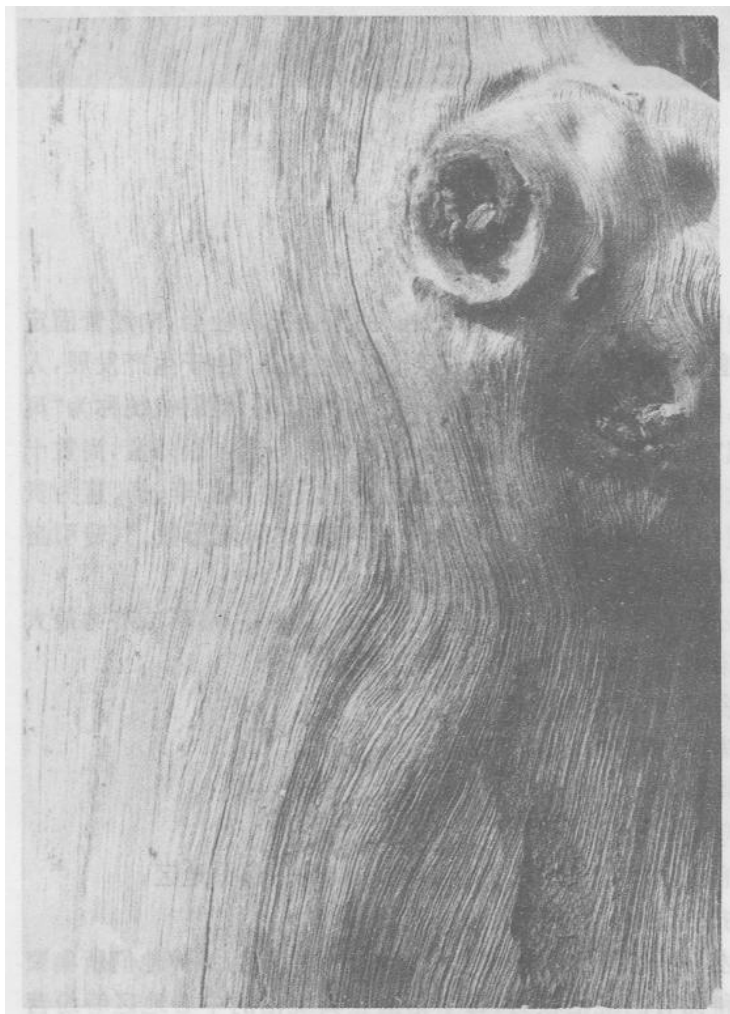
“佛塔”有崇圣寺千寻塔、昆明东、西寺塔等。

在此时,一般平民建筑还没有萌发再生的意识,而且,也没有获得再生需要的物质支持。只有贵族建筑、宗教建筑等汉化最早,也汉化最彻底。至今在大理遗存的古建筑,几乎没有不是汉式的。

(2)在形式上,当初传阶段,“汉化”还局限在“硬搬”中原已有建筑的形式上。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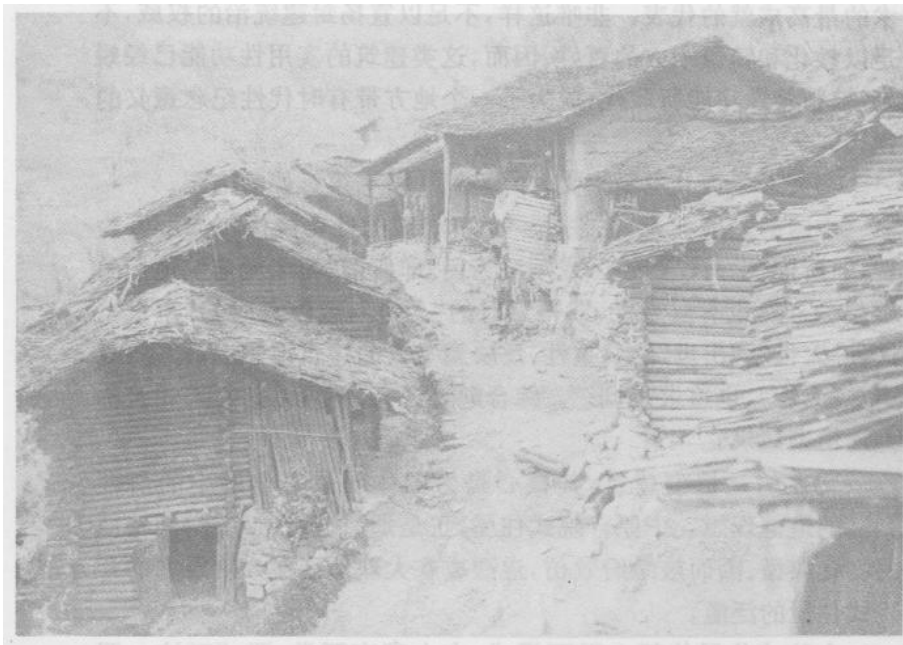
“南诏大衙”:论规模,论标准等,虽不能与唐代的宫殿相比,但它显然是着意模写唐代的宫殿制度,是唐代宫殿的地方化和微型化。

“佛塔”:在大理地区传统的信仰体系中,有着对“柱”的崇拜。但在新时期到来后,转向了对塔的崇拜,并把方形平面的密檐式唐塔搬来,取代了原先柱的地位。大理崇圣寺千寻塔、昆明东西寺



A15 “木”的“思维”





A16 “木”的创造:新寨白族的木楞房



A17 古老的印迹:石钟山石窟中的木构建筑形象

塔,莫不是唐长安小雁塔在云南的再现。(图 A17)

“庙宇”:南诏前后时期新建的庙宇,在其平面规制和艺术风格上,也都效仿于中原。相传始建于唐代的昆明圆通寺,尽管后代有过许多重大的变更,但其平面格局,尚保持着唐代殿廊式庙宇的遗风。

(3)在技术上,当初传阶段,“汉化”还停留在引进中原技术阶段。著名的崇圣寺、崇圣寺千寻塔、昆明东西寺塔等,都是延请唐代工匠主持建造的,文献中的下述记载可为佐证:

“唐遣大匠恭韬徽义至蒙国,于开元元年,造三塔于点苍山下。建崇圣寺于塔上。”“王嵯巛诣善阐(今昆明):建觉照慧光二寺,命大匠尉迟恭韬烧造砖石。”(以上转引自《史稿》P. 147—148)

又据历史文献记载:“太和三年,嵯巛乃悉众掩邛、戎、嵩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郭。……将还,乃掠子女工伎数万引而南。……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新唐书·南蛮传上·南诏传》)

由该记载可以推想:由成都掳掠来的数万“子女工伎”中,不会没有建筑工匠。大理地区流传的木构技术、制瓦技术、雕刻与塑造技术等等,最初都有外来工匠的贡献。

## 2. 深化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指元明清三代。

上面已经提及,从元代开始,云南作为一个行省,已完全统一在中央政权之下。文化中心虽已东移昆明,但是大理的历史地位并未完全失落。

所谓深化阶段有这样的背景条件:

(1)地方的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已经取代了奴隶主的地位,成为封建中央集权在地方的主要支柱;

(2)元代以后儒学的广泛传播。汉文化由贵族阶层逐渐流向广大民间。一个受儒学熏陶的文人阶层在平民社会中崛起。由于他们所处的特殊地位,导致他们对建筑有特殊的价值追求,于是,在贵族建筑(或可称为新时期的官方建筑)与平民建筑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人建筑。这种建筑的新分化,一直保持到近代。(图 A18)